

文化叢書

中國版本

薛冰著



插图珍藏本

插图本

主编 任继愈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215262

小

G256.22

X941

著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主编 任继愈

插图



江苏古籍出版社

04P26/6

7215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薛冰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12(2003.8重印)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80643-796-7

I. 插... II. 薛... III. 插图—版本—中国—古代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805 号

书 名 插图本
著 者 薛 冰
责 任 编 辑 吴 迪
出 版 发 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心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 行 部 电 话 025—3223462
集 团 地 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心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编 2122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 张 11 $\frac{5}{9}$
印 数 3001—7000 册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80643-796-7/K·24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任继愈
学术顾问 黄永年 傅熹年
执行主编 薛 冰 徐 雁
编 委 马清江 王余光 王振羽
邢永川 刘玉才 陈子善
郑伟章 胡慧斌 姚伯岳
倪培翔 徐 雁 董宁文
薛 冰

总 序

黄永年

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所讲的版本，是书的版本，是中国书籍的版本，而且主要是讲现代书籍之前通称为古籍的版本。这好像只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问，其实并不尽然，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经常接触使用古籍的人，都得多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也有很多学人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成为古籍版本专家或爱好者。范围再扩大一些，有许多并非从事研究或教学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对古籍版本发生兴趣。请看中国书店等拍卖旧本古籍时场面是何等热烈，今年我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这方面的讲演，听者也座无虚席，所有都说明这项学问确已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上认可并欢迎这项学问，但出版界提供的读物却不怎么多。现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只有几种教材性质的东西，不仅多数简单得有似提纲，且平铺直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读性。很惭愧，我在这方面也写过两种，一简一详，可详也不到二十万字，只能在版本演进的历史和各个地域各个时期的特色上做到科学的讲述，要生动活泼，使非专家也爱读，颇感无能为力。再看近年来以“收藏”为名的刊物已层出不穷，多数只讲陶瓷、古钱、玉雕、漆器之类，很少涉及版本。我认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如今出版的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很有创意，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并且把版本这门学问从学者的书斋和图书馆的善本部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多种专册来撰写，力求反映出我国版本研究的最新风貌和水平。当然，有人怕这样体例会欠统一，还会出现重复，我认为不必担心。体例是大体上做到统一的，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教科书那么章节井然。我回忆当年步入古籍版本领域时看了些什么书，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各家的书目和题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哪拘于一个体例，一个框框，可就是把版本之学学到了手。一套丛书十几种，内容有时出现点重复也不要紧，如有说毛晋汲古阁是家刻，也有说应属坊刻，各人写各人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尽一样，来点百花齐放，岂不比一花独开更有意思。

过去我看的讲版本的书，都有个缺点，即只有文字，有些东西说了半天不一定说得明白，要看原书才清楚。原书不易看到，可以看它的图像，这过去习惯叫书影，即用豹窥一斑的办法，把该书选择一页刻印或影印出来，现在通称之为图录。这种书影、图录过去出过几种，建国后还出了一部大型的《中国版刻图录》，由前辈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主持其事并写了解说，只是写得较简略，明清部分也选得太少，不能让人们看到现存明清本的整体面貌。今天好了，这套丛书分专册编写，每册本身就附以大量的图像。而且以往的书影、图录好的用珂罗版印，差的用胶版以至石印，都只有黑白两色，连收藏印记都无从套红。这套丛书则改用彩色印制，让读者如同见到原书。这样一册在手，图文并茂，使艰深的专业知识化开来，明白易读，好似看图认字和看连环画小人书那样，自可大大增加阅读的兴趣。

中国是雕版印刷以至活字印刷的诞生地，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是中国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的光辉灿烂的篇章。老一辈的专家已在版本这门学问上作出了让我们仰慕的业绩，今天有志于此道者更应努力，使之后继有人，而且后来居上，这是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心愿。我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我这个心愿的实现得到有力的保证而决不使之落空。

目 录

上编 小史

从帛书到纸书	8
版画的产生和早期版刻插图	14
承前启后的宋、元版刻插图	20
版刻插图的黄金时代	33
朴拙自然的建安派	52
兼容并蓄的金陵派	58
登峰造极的新安派	69
旁枝逸出的杭州派	77
精巧秀美的苏州派	85
版刻插图的衰落	92
中西版刻插图技艺发展的比较	98
新式印刷时期的书籍插图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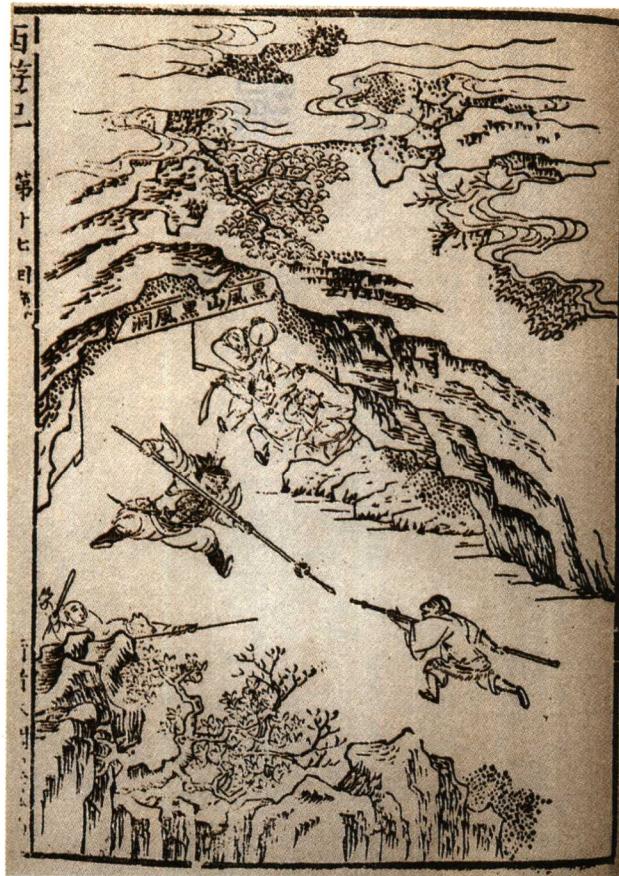
下编 摄英

《新定三礼图》	113
《天竺灵签》	116
《御制秘藏诠山水图》	118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121
《全相平话五种》	123
《饮膳正要》	126
《武经总要前集》	128
《太音大全集》	131
《圣迹图》	133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 厢记》	137

《救荒本草》	139
《闺范图说》	142
《水浒传》	145
《便民图纂》	149
《顾仲方百咏图谱》	151
《养正图解》	153
《有像列仙全传》	156
《三才图会》	158
《坐隐弈谱》	161
《列女传》	164
《青楼韵语》	168
《楚辞述注》	170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173
《天工开物》	176
《瑞世良英》	178
《离骚图》	181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184
《授衣广训》	187
《高士传图像》	189
《槜李谱三种》	192
《攀古楼彝器款识》	194
《归元镜》	196
《五洲图考》	198
图版索引	201

上 编

小 史



明天启年间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插图

本书以中国古籍插图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拟从发展源流与版本文化的角度,对上自肇端、下至清末的中国古籍插图本进行系统阐述。

“图文并茂”,可以说是中国书籍的传统之一。而经史子集各部类古籍中,也确实都有插图本存在。或许正因为插图本的广被性,中国古籍中的插图与插图本长期被读者熟视无睹;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中,都不曾将插图本单立一类。古籍插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专门研究对象,只有短短百年的历史;就在这百余年间,研究者的立足点,仍多偏重于美术史的角度,即书籍插图作为版画的艺术性。

迄今为止,一些重要的相关工具书,如《图书情报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光盘版),《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书海出版社 1997 年版)等,都没有列出“插图本”的条目。

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印刷史中,早期著作如孙毓修先生《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年五月版),陈彬龢、查猛济先生《中国书史》(商务

印书馆民国二十年九月版)等,都没有论及插图本。直到 20 世纪后期,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用书”的《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中,仍完全没有提到版刻插图和插图本。《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版)仅有两小节论及明、清的版画和套印。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中,对于版画作品、流派特色以至刻工家世记述较多,只是仍出于印刷史与艺术性的角度,明确以“板画”为标题。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来新夏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在说到“明代盛行带有图画的书籍”时,一笔带过,只认为“这些精美的绘画成为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的重要手段”。

最早系统论及中国古籍插图的当是郑振铎先生。他在 1927 年 1 月发表的《插图之话》(《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一号),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籍插图简史,其中阐述了插图的作用及其发生作用的原理:“插图是一种艺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插图作者的工

作就在补足别的媒介物，如文字之类之表白。这因为艺术的情绪是可以联合的激动的”，“从这个相互联络的情绪制御着各种艺术间，而插图便发生了。所以插图的成功在于一种观念从一个媒介到另一个媒介的本能的传运；愈自然，愈少于有意的做作便愈好”。他并且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在1932年出版了作为“第一次尝试”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该书例言中，郑先生明确指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也就是说，补充或丰富了文字所表述的内容。

鲁迅先生在1934年也曾指出中国古籍插图的产生，是“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连环图画琐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进一步论及书籍插图的重要作用：“书籍中的插图，并不是装饰品，而

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不必说地理、医药、工程等书，非图不明，就是文学、历史等书，图与文也是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的”；“有了图，可以少说了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有茫然之感”；“论述文物制度者，以不见图像实物，每多影响之辞，聚讼纷纭而无所归。图文既不能收互相发明之用，史学家遂终其生于暗中摸索，无术以引进于真实的人民历史之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自序、跋，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

80年代，李致忠先生在《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中，以专门一节论述《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并明确指出：“书籍的插图，是对文字的形象说明，它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形象的概念，加深人们对文字的理解。”此后《中国美术全集·版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载王伯敏《中国古代版画概观》文中也说到古代版画作为书籍插图的作用：“既美化图书，也使文化教育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科技用书，有图与无图，收效大不一样。”

正因为古籍插图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成为研究对象，插图本的研究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要将插图本作为中国版本文化中的一个特定范畴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插图本概念的界定。

在赵国璋先生等主编的《文献

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中,已列有“插图本”的辞条,其解释是:“一般指戏曲小说之附有插图者,其书每在书名前冠以‘出相’、‘出像’、‘绣像’、‘绘图’等字样。”同年,程千帆先生等著《校讎广义》(齐鲁书社 1991 年版)中,在谈到雕印本的品类时,也举出了插图本,其定义则大为宽泛:“凡有插图的雕印本书籍称插图本。”瞿冕良先生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 1999 年版)后出,其中是这样定义的:“插图本,亦称插画本。书中附有插图,常在书名前冠以‘出相’、‘出像’、‘绣像’、‘绘图’等字样。特别是古人所刻印戏曲小说,每多插图本的。”此说比程说严谨,比赵说宽松,但仍以戏曲小说插图本为重点。

将插图本的范畴局限于戏曲小说,既不能全面地反映前辈学者对于古籍插图的研究成果,也不符合现存古籍插图本的实际。非文学类的古籍插图本大量存在,特别是科学技术类插图本,更受到前辈研究者的重视,有“非图不明”的说法。因而两者不可偏废。这种局限性的发生,很可能是受到过去版画研究的影响,因为戏曲小说插图的艺术性受到高度赞誉,也就简单地以其为插图本的代表了。

可供借鉴的还有国外研究者对于插图本的定义。如日本《出版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纂的《简明出版百

科词典》(申非等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中,对于插图本(绘入本)作了这样的界定:“从字义讲泛指带有插图的书,在日本则特指江户时代出版的有插图的书。这类书与连环画之类的绘图读物不同,主要是为引起儿童兴趣,或帮助理解,插入从属于文章的图画,而不是以图画为主。”日本汉学家相当重视中国古籍的插图本,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明代插图本图录》(内阁文库所藏短篇小说之部)和《明清间绘入本图录》在昭和三十七年(1962)和五十五年(1980)先后出版。

2001 年 3 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的中文译本,这本简略的中国史中以《书籍插图》为标题写下了短短的一节。因为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也因为她本人所作的正是插图本,所以伊佩霞对于插图本的功用及其产生环境作出了简洁的说明。她指出,“插图被用来吸引读者对各种书籍的兴趣”;在晚明那个刻书业迅速发展、充满竞争的市场上,“为了使自己的书更具吸引力,书坊日益频繁地聘请艺术家画插图,先将它们刻在木板上,然后印在书的空余地方。”笔者没有读到此书的原文,但很怀疑此处翻译有误,因为插图和文字常常是刻在同一块木板上,而且大多是安排在预先设计好的固定位置上。引文所说,很像当

代书籍尾饰的应用法。但作者的这一论述肯定也是正确的：“由于书坊为这些插图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插图艺术进步神速。”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对中国古代插图本作如下定义。

插图本，应是以文字为主、图画为辅的书籍。书籍插图的目的或作用，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帮助读者对文义的理解；优秀的插图也能提高书籍的视觉美感。所以，书籍中纯粹用于装帧的题花、尾花、边饰等饰图不能视为插图。同时，并不是所有包含图画的书籍都可以称为插图本，完全以图画构成的书籍，如各种画谱、画册、摄影图册等，或者以图画为主、配合简要说明文字的书籍，如连环画册、地图册等，一般亦不视为插图本。此类书籍，除了在版刻插图演进发展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一般也就不在本书的关注范围之内。

另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是，中国古籍的插图与版画，往往被混为一谈。讨论古籍插图的人，多仅限于版画；而研究版画的人，又必然以古籍插图作为重要对象。实则古籍插图与版画之间不能划等号，它们可以比作相交的两圆，虽有相当大的重叠部分，但也有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不能完全重合。

说中国版画“起自书籍的插图”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是大致正确

的；但换个角度，说书籍插图即是版画，则肯定不能成立。诚然，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在近代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木刻画乃是主要的传播艺术形象与科学知识的武器”，而中国古籍插图最精美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版画艺术最辉煌的时期。但是，第一，传统版画出现之前，尤其是衰微之后，中国古籍的插图艺术，仍有可圈可点的篇章；第二，版画的某些经典作品，并非书籍插图；第三，而某些重要的书籍插图，也未必是版画作品的典范；最后，书籍插图与版画作品的作用和评价标准也不尽统一。所以，作为版本文化的插图本研究，也就必然要突破美术史的视野和版画史的范畴。

上个世纪末，出版界的先行者，就已经宣称中国将进入“读图时代”，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推波助澜，使插图本的出版日益成为潮流。当此之际，对于中国书籍曾经辉煌的插图史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回顾，无论对于继往还是开来，应该都是必要的。然而，如本书所设想的，从版本文化的角度，以插图本作为专门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毕竟还是一次尝试。著者诚挚地希望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够对推动中国古籍插图本的研究有所裨益。

最后要说明的是，书籍的插图，理应附着于书籍，所以中国书籍插

图史的分期，也可比照中国书籍史的分期，即依照书籍的生产材料与制作方法，大致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书籍的刻划抄写时期，书籍的雕版印刷时期，书籍的新式印刷时期。在每一时期中，又存在着其循自身规律而产生、发展、兴盛以至衰退等若干阶段。

由于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以中国古籍的版本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本书当也以雕版印刷时期的插图本为讨论重点。同时，为避免与丛书中的其他各册重复，本书也只以古籍插图及插图与文本的关系作为讨论重点。

从帛书到纸书

众 所周知，构成书籍的最基本因素是文字。

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出于两个源头，一个是结绳与刻划符号，一个就是图画。考古学已经证明，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绘制壁画，把生活中的事物生动地表现出来；由此推想，用图画来传情表意，当时已经有可能成为人类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图画，被研究者称作“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它们中的一些，就是图画，而有一些已经有向文字发展的趋势。

文字的演进定型，为书籍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中国书籍史的研究者通常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作为书籍的初期形式。在这两种“书籍”中，文字都还保留着相当浓郁的图画意味。甲骨文中的名词，特别是动物名，如“鱼”、“虎”、

“鸡”、“龟”、“马”等字的写法，与其图像仍十分接近，不识甲骨文的人，都可以一眼看出。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鸟、兽、器物等由于图案性太强，至今尚未有确定的释文，研究者在转录时往往只能依样画葫芦，形成一种“图文并茂”的情况。

但是这些图画文字或图案性文字，仍然属于文字，而不能看作文本以外的插图。

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的，是据信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春秋战国得到广泛应用的简牍。

在竹简或木片上书写而成的简牍书籍形式，对于中国的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的一些有关书籍的重要名词术语，如“册”、“卷”、“篇”、“版”、“编”等，就都源于简牍；从帛书到雕版书籍以

至部分铅印书籍中长期沿用的栏线，也是对于简册形式的模仿。据钱存训先生研究，古籍书页文字和传统书写习惯中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形式，亦从竹简书写的方式演化而来。

现存简牍形式的书籍中，还没有发现插图本的存在。这是由简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所决定的。用于书写的竹简和木简，都是很窄的细长条，一般只能写一行字；能写两行字的稍宽的简，就有了一个专用名叫“两行”，而且多用于书写诏书。所以研究简的人，通常只注意它的长度变化，很少涉及它的宽度。这样细窄的简上，自然难以绘制插图；而编连起来的简与简之间，又必然有着空隙，难以构成完整的画面。

在简牍时期，能够用于绘图的，有两种材料。一是比简宽的木版。版面大到一尺见方的，也有一个专用名叫“方”。当时用版或方来绘制的图，主要是地图，所以后世将领土范围称作“版图”。绘图的木版相当笨重，携带也不方便，尤其是在将简编连成册的时候，这样的图版却没法编进去，所以也就难以成为“插图”。至于这种图版是不是可以“插”在简册的起始或结尾处，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例证。

再一种就是帛。

帛是多种丝织品的统称。在丝织品上绘制装饰性图案，很可能在

周代就有发生；但帛被用来作为书籍的载体，大约始于战国时期。帛书的出现稍晚于简牍，却与简牍有一个相当长的并行时期；因为它虽然较简牍有很多优越性，但是丝织品的成本过高、产量有限，所以不可能完全取代简牍。

据史籍记载，在帛书出现后，曾产生过简书文字配以帛绘图画的形式，但究竟是文配图，还是图配文，尚待进一步研究。

《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易》中，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的著录；《诸子略》中，“《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内，据前人考证也有图一篇；《兵书略》中，有多种兵书名下注明有图若干卷，总计“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可以确定为图文相配者至少有十三种。

这一时期的书，主要还是简牍，而图，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就是帛图。在《术数略》中，明确载有“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东南大学丛书，民国十一年版)此条注疏中说：“帛图，盖记之于帛者也。”这部《月行帛图》虽然亡佚了，不能知道它的具体形式，但此书之图是绘在帛上的，则没有疑问。

所以，在简牍时期，“书”与“图”至少在形式上是分离的。《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所说萧何随刘邦进